

TAIPINGYANG ZHANZHENG YU
ZHONGMEI GUANXI

太平洋战争与 中美关系



刘建飞 主编
高祖贵 梁亚滨 副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太平洋战争与 中美关系

TAIPINGYANG ZHANZHENG YU
ZHONGMEI GUANXI

刘建飞 主编
高祖贵 梁亚滨 副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战争与中美关系/刘建飞主编;高祖贵,梁亚滨
副主编.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54-0252-9

I. ①太… II. ①刘… ②高… ③梁… III. ①中美关
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②太平洋战争—史料 IV. ①
D829.712 ②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908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2 幅 21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录

001 / 对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东亚政策的再思考	熊志勇
009 / 太平洋战争前（1937—1941）日本对美宣传之初探	杨大庆
024 / 太平洋战争前国共对美英战略的演变	王红续
036 / 帝国的竞争：太平洋战争的根源	梁思文（Steven Levine）
047 / 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由史迪威在华经历所想到的	章百家
058 / 抗战时期中共对美国看法及政策之演变	陈 兼
072 /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胡 岩
083 / 时间、形体和颜色：评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新崛起	刘晓原
104 / 伯奇事件与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共关系的起伏	任东来
113 /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	于英红
126 /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元首外交”	申晓云
141 / 史迪威将军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John Easterbrook）
145 / 再论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从历史人物性格因素对历史事件影响的视域出发	熊宗仁
155 / “滇缅公路”上著名的“24 拐”在贵州	戈叔亚
165 / “24 道拐”与中美关系	罗用能
175 / 二战与英属缅甸的独立	岳 蓉
184 / 附录一 致大会的信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John Easterbrook）
186 / 附录二 太平洋战争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梁亚滨

对太平洋战争前美国 东亚政策的再思考

熊志勇

日本在 19 世纪末就开始了在东亚的扩张政策。进入 20 世纪后，美国曾试图凭借门户开放政策来制约日本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但效果有限。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升级。当时，中国政府一再向美国方面求助，但美国只发出了一个被称为“不承认主义”的声明。中国官员对这样一个大国的表现极为失望。后来的中国学者对美国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指责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政策是“远东慕尼黑”。美国的学者中也有绥靖的评价。战争爆发的历史已过去 60 年，如此长的岁月变迁应该足以让今人对当年美国政府的决策从全局而不是局部的角度作出恰当的评论。

一、美国国内的形势

常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影响美国战前外交政策，包括东亚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显然是当时美国的国内形势。20 世纪 20 年代末，证券市场崩溃的连锁反应导致美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批银行倒闭，如 1931 年银行破产 2294 家，1932 年破产 1456 家；从 1929 年到 1932 年，企业破产 109,371 家；失业人数 1933 年初达到 1400 万。经济萧条，下层贫困、社会动荡。罢工和抗议活动频频发生。1932 年初，为了对付首都附近的退伍军队示威，美国政府甚至动用了军队。人们甚至谈论如果胡佛总统连任，美国会发生革命。在这样一种极为糟糕的国内环境下，美国政府无暇顾及东亚发生的事件，胡佛总统曾这样讲：“无论是我们对中国的义务，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我们的尊严都不需要我们因满洲问题进行一场战争。”按国务卿史汀生的话来说：“这时如果有人打算发动满洲事变而免受别国的干涉，那么选择这个时机确实是十分合适的。”在舆论方面，美国公众广泛支持政府谴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但普遍反对过分对日本施加压力，害怕导致战争和损害经济。如

1932年2月头两周，总统每天收到35—100封民众来信。多数人要求政府不要介入中国冲突，最担心的是军事卷入。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实质性利益值得去冒这种风险”。

胡佛应付危机无力，1933年随着欧洲发生金融崩溃，美国出现恐慌。在这种形势下，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强调：“道德让我们坚持我们牢固的信念：我们不得不恐惧的唯一事物，是恐惧本身。”他提出紧迫的任务是让人们有工作做，并对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进行改革等等。罗斯福实行了以加强政府调控为特点的新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如制定银行法，加强对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监管；通过美元贬值稳定货币的含金量；大量增加公共工程项目，增加就业；减少劳动时间和提高最低工资，既为了降低失业率，也为了改善工人生活状况；设立联邦农业信贷机构帮助农民赎回土地；通过社会保障法，建立老年保险制度和失业救济制度等等。新政有了成效，美国金融业稳定下来，经济逐渐恢复。1936年，罗斯福以压倒优势成功地在竞选中获得连任。1937年1月，他在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强调要帮助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低收入者。然而，由于限制信用、缩减联邦开支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又导致1937年后的经济不景气。结果，美国政府不得不恢复财政赤字开支，放松信用，继续增加公共工程，并通过立法进一步实行改革，如制定国有住宅法、农场租佃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等。罗斯福在1939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为了保持我们的改革，现在我们的全部精力可以用来加紧复兴过程。”美国政府的精力都用于解决经济困难。由于美国这种巨大的努力，经济状况迅速得到恢复。从数据上看，美国的GDP在1931年为709,332百万美元，1933年落到602,751百万美元；1937年本已恢复达到832,469百万美元，但随后又下跌，1939年终于重新恢复增长的势头，当年929,737百万美元，此后逐年上升。随着美国经济状况好转，国内矛盾大大减轻。这使政府有可能转而关注国际事务。

二、美日力量的比较

经济力量增长，也就意味着美国实力的提高。从表面上看，在这次危机前，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但针对东亚地区来说，美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力量未必能与日本匹敌。自20世纪20年代的华盛顿会议之后，由于《九国公约》等原因，日本的反美情绪越来越激烈，一些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鼓吹对美战争，“他们明确地把美国视为最大的绊脚石和潜在的敌人”。1932年3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给国务卿的报告认为：日本当时的目标和政治观类似1914年以前的普鲁士。面对日本的挑战，美国总统不能不考虑必要的

军事准备。胡佛曾让其军事顾问就对日作战问题进行可行性研究，结论是准备工作需要四至六年时间。就海军而言，虽然当时美国整体上比日本多六艘战列舰，但是在远东日本拥有的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都比美国多。况且，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财政很困难，无力在远离本土的地方支持一场战争。

与美国相比，日本却是咄咄逼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经济发展非常迅速，速度仅次于苏联而位居第二位。1931 年它的 GDP 为 14,767 百万美元，到 1940 年上升为 25,001 百万美元。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梦想，日本政府投入巨资发展军力。日本军费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由 1931—1932 年度的 31% 上升到 1936—1937 年度的 47%。当时，日本大藏省负责人高桥内一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主张限制军费增长。对其强烈不满的军国主义者刺杀了他。随后，日本军费占政府开支比例高达 70%。相比之下，1939 年美国的国防开支才占政府预算的 11.7%。1938 年日本的军费开支为 1740 百万美元，而美国只有 1131 百万美元。

在高速发展军事力量的过程中，日本海军建设超过了《五国海军条约》对它的限制，如重型巡洋舰的排水量接近 1.4 万吨，比规定多 8000 吨。其大和级巨舰，吨位居世界之首。它的军舰航速快，火炮装备威力大。日本海军航空兵拥有 3000 架飞机，集中于 10 艘航空母舰上。到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陆军已超过 100 万人，还有 200 万训练有素的预备队。陆军也拥有 2000 架作战飞机。日本依仗它的军事力量发起了侵华战争。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1938 年时，在能反映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的钢铁产量上，美国是日本的 4 倍；美国的工业潜力更是日本的 6 倍。在经济恢复之后，美国依然不遗余力地巩固经济基础。到 1941 年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 5 倍，煤产量是日本的 7 倍，机动车的产量是日本的 80 倍。美国对日本有着绝对的经济优势。由于面临日本和德国的威胁，1938 年，罗斯福总统敦促国会在 5 月通过了扩充海军法，以便美国在此后的 10 年中建立一支能对付德意日联合在一起的海军舰队。1939 年 1 月，他提交的财政预算中军费占了 15%，并得到国会的认可。1940 年，美国同样大幅度地增加国防预算，达到 15% 以上。5 月，美国国会同意增拨军费 17 亿美元，扩充兵员达 37.5 万人。凭借着巨大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美国在 1940 年海军战舰增加了一倍，陆军航空兵拥有 7800 架作战飞机，并迅速建立起一支近百万人的陆军。在短暂的时间里，美国的军力超过日本。1940 年 4 月后，美国一支舰队在完成训练后没有返回大西洋，而是留在珍珠港。1941 年，美国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亚洲战区司令；威慑日本的战机被运往中国和菲律宾。日本海军战舰力量 1941 年末为美国的 70%，1942 年为 65%，1943 年为 50%，

1944 年下降到 30%。简单地就军事实力做比较，日本失去太平洋战争有其客观上实力不足的原因。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等就意识到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美国政府还认为自己不具备两洋作战的能力。根据美国的彩虹 5 号计划，美国的军事资源只能先集中用于大西洋，解决欧洲的问题。在东亚，美国政府希望经济制裁会对日本起到威慑作用。为了拖延与日本的摊牌，美国与日本展开秘密谈判。美国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去激怒日本，甚至准备与日本达成一个临时协定。怎么能把这种策略上的妥协视为“远东慕尼黑”式的交易？1941 年 11 月 26 日，赫尔向日本代表发表声明，强调日本若想要和平就必须遵守相互之间以及任何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包括商业机会和待遇的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美方具体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而且要求日本不得支持蒋介石政府以外的任何政权。美国的声明坚持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原则，日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种交易，并把这个声明视为最后通牒。它试图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先声夺人，打乱美国的战略布局。结果，被激怒的美国提前对它开火。美国先后对日德宣战。

虽然美国被迫两线作战，但凭着它的实力，一旦加入战争，就扮演了世界拯救者的角色。它的 2000 多架重型轰炸机把德国控制的欧洲地区炸得稀烂，它的 1000 架超远程 B29 型轰炸机曾使日本许多城市化为灰烬。当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海军，包括 1200 艘大型军舰，其中以数十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组成作战舰队。战争的环境甚至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的 GDP 竟几年间增加到 1945 年的 1,644,761 百万美元。当其他国家都被战争搞得穷困潦倒时，“从经济上说，美国可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三、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要打有把握的胜仗不仅需要实力，而且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的确，美国从 19 世纪以来就很重视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19 世纪末，面对中国被瓜分的局面，美国进一步倡议“门户开放”政策来保护其利益。1921 年，美国又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九国公约》使这项政策有了一定的法律地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东北形势，美国政府只在 1932 年 1 月发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被称之为“不承认主义”的声明，即不承认日本侵略可能带来的对美国不利的后果。但这并

不表明美国会牺牲自己的重大利益。美国从外交上反对日本侵华。

1932年1月底,日本在上海制造事端,甚至炮轰上海。这就直接触及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在华投资的2/3在上海,包括远东最大的电力公司和电信公司。美国在上海的侨民最多,达到3500人。美国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指出:若日军占领闸北,“长江流域的整个形势将发生变化”。31日,总统召集了有国务卿、陆军部和海军部部长、总参谋长等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决定从菲律宾马尼拉调兵和舰只前往上海,使在上海的驻军达到2800人。2月,美国政府介入此事,联手英国。它向日本方面重申《九国公约》,表示美英决心保卫公共租界,决不容许日本利用其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日本终于在5月同意撤出占领区。

1932年3月9日,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在长春成立。美国政府拒不承认。虽然美国当时在东北的实际利益几乎没有,但日本此举严重地破坏了门户开放政策。8月10日,国务卿史汀生对日方说:美国不会同日本在满洲争夺政治影响,也注意到了日本在那里的权益,但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违背了中国的意愿,在满洲造成“独裁、混乱和敌对”。美国还反对其他国家同伪满发生关系。尽管当时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但在美国的影响下,国联成员法国、波兰、伊朗等国都改变原来的打算,不与伪满建立关系;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终于通过了根据调查所提出的最终报告书。报告书明确地指出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应得到遵守,满洲的主权在中国。

相比之下,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东北当局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中国南京政府也听之任之。此后,南京政府对日本在华北地区的扩张仍然步步退让,订立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不断地向国际求援。当事国不积极抵抗日本侵略,怎么可能指望美国出手帮助?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才转向抵抗日本的政策。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战争。1941年底,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51个师中的35个。这就给建立反日的国际联盟提供了条件。

1937年抗战开始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10月,罗斯福发表了针对日本和德国的“检疫隔离”侵略者的演说:“世界上90%的人的和平、自由和安全受到其余10%的人的破坏,那些人威胁要打破所有国际规则和法律。”他把这种威胁比喻成疾病,“当流行性传染病开始传播时,社区就同意一起把病人检疫隔离以保护社区健康免受疾病的传染。”“美国讨厌战争,美国希望和平,所以美国要积极行动寻求和平”。11月,美国支持国联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中日战争问题,并派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遵守

《九国公约》。1938年初，美国决定不再向日本提供贷款，同时决定从6月起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由国务卿出面，以人道主义为由，劝告军火商不要再出售飞机和军械给日本。

1938年11月，日本宣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宣称旧的秩序不复存在，呼吁亚洲国家与日本建立一个新的地区体系，该体系将代表亚洲的价值观和原则，不再受西方人的控制。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表示希望中国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议。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面对日本的严重挑战，美国政府不得不于30日严正声明：美国政府知道由于日本的行动造成形势的改变，“但是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和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主权范围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条件和状况，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掌权者和代言人。”赫尔国务卿公开地否认日本有权自行创建新秩序，声明美国坚决反对日本的单边主义，除非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否则美国不会接受对地区现状作出任何形式的变动。1939年7月，美国政府采取了第一个对日本正式的贸易制裁措施，到1941年8月1日，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全面禁运。与此同时，1939年11月美国国会修正了中立法，规定所有的武器贸易都可以按现金购买、自理运输的原则进行。美国为了帮助中国购买武器和其他物资，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10月先后向中国提供合计7000万美元的三笔贷款。

1940年11月日本承认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美国立即宣布只承认按照合法程序产生的重庆政府。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1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民，在抗拒中国被敌人宰割中显示出同样伟大坚强的意志。中国通过蒋介石委员长要求我们提出帮助，美国已经答复，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得到我们的帮助。”5月，美国同意中国取得租借援助。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来华，担任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8月，美国志愿飞行员在陈纳德的指挥下，正式成立飞虎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在中国西南承担防空任务。10月，美国军官团抵达重庆，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正式开始。美国军官团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国民党军队和指导运用根据《租借法》从美国获得的物资装备。

美国没有更早期地对日本开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国在欧洲的扩张。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与日本一样加紧了在欧洲的侵略行动，并于1933年退出国联，凡尔赛体系实际上崩溃了。德国希特勒指责各种和平条约，大规模扩充军队。1936年初德军开进非武装的莱茵地区。年底，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结成联盟——轴心国。欧洲的和平面临威胁，但美国政府几乎视而不见，采取中立立场。美国上下普遍认为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内经济，要避免国外的纠纷。1937年4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70%的美国人认为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是个错误。

然而，罗斯福清楚，对日德的侵略必须加以制止。1939年1月，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虽然强调国内改革，但不再提新的措施，而着眼于国际形势。他强调侵略者越来越强大，需要认真的合作才能抵抗侵略者，提出要采取“除战争以外”的手段来阻止侵略。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3日，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虽然美国仍宣布中立，但在10月，罗斯福敦促国会废除中立法中的武器禁运条款，对军火贸易作了“现款自运”的规定。这就便于美国对英法等国提供帮助。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已有倾向性。1940年，德国军队通过闪电战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6月占领巴黎。英国面临巨大威胁。罗斯福多次讲话表示美国不能对侵略袖手旁观。美国民众也意识到若英国失陷，美国的安全与利益将受到威胁。9月，美国总统以行政协定的方式把50艘旧驱逐舰转让给英国。就在这个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署。世界上两大战争集团阵营分明。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更是进一步向英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对盟国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这时，美国三分之二的公众相信希特勒会很快入侵拉美，结束“美国的生活方式”。特别是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罗斯福明确地认为：“希特勒的军队今天是对南北美洲的主要威胁”。9月，罗斯福下令为向英国运送物资的船只护航，11月，美国国会不再禁止美国武装商船进入战争地区。美国已经准备介入欧洲战争。这期间，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战争计划。彩虹5号计划确认大西洋战略优先，要先集中力量解决德国的威胁，然后再来处理日本的威胁。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军事资源不足以两线作战，罗斯福指出：“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海军可供调遣——太平洋上每个小插曲都意味着减少大西洋上的兵舰。”11月5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给罗斯福的联合报告称：“当前，太平洋上美国舰队的力量不及日本舰队，无法在西太平洋展开一场无限制的战略进攻。若想能够这么做，那只有从大西洋上把所有海军的舰只都抽调来加强太平洋上的舰队，仅在当地留下用于防守的军力。太平洋舰队实施无限制的进攻时还需要非常大量的商船，这也只能从目前十分重要的现役船只中抽调。从大西洋抽调军舰和商船将造成英国在不久的将来的大西洋战役上失利。目前在远东与日本作战的计划是进行防御战”，除非日本进攻或直接威胁到对美国的安全来说极为重要的领土。欧洲的形势更为紧迫，英国很有可能挡不了德国的进攻，而在东亚，中国拖住了日本侵略军。美国官员认为有可能通过威慑和谈判来阻止日本扩大战火。

然而，日本不愿意作出妥协。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最终还是先对日本开火了。11日，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同一天美国也向它们宣战。

四、总 结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世界上兴起三个强国：亚洲的日本、欧洲的德国、美洲的美国。日本和德国都雄心勃勃地想争霸世界，并选择了旧时大国崛起的道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把这两个国家带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它们先是向周边国家发动侵略，继而向霸权国英国发起挑战，最后都与美国为敌。其中，试图脱亚入欧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断地扩大在中国的侵略范围，20 世纪 30 年代又提出要把欧美人赶出亚洲的“东亚共荣圈”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与德国结盟，后又攻击美国。然而，这两个国家在美国、英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反抗下最终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次战争对日本的后果是致命的。肯尼迪教授评价说：“如果日本军事领导人在 1937 年不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如果他们在 1941 年不发动更具有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那么，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日本也许提前许多年就实现了它到 60 年代中期才实现的超过英国产量的这一目标。”

反观美国的应对之策，美国的东亚政策把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时间推迟了十来年。在这段时间里，它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战胜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强基础建设和工业发展，从而奠定了强大的军工基础，取得了对日本的绝对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美国政府牺牲了一些在中国和东亚的利益，它的“软弱”也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为了改变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罗斯福总统甚至没有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行动而遭到日本对珍珠港的打击。珍珠港事变对美国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在国内它唤起了美国的公众，全民同仇敌忾，在国际上它让美国取得了对日本的绝对道德优势——反侵略。当美国全面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反法西斯阵营几乎可以说已取得对法西斯阵营的优势。美日德之争，美国胜出。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取胜的不只是一场大战，而是它凭借自己的整体实力在世界上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新的国际体系。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准确地权衡利弊，在关键时候以国内事务优先，以一定的代价换取时间，扎扎实实地奠定了美国的实力基础，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美国的利益。他不愧是美国以至世界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熊志勇，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太平洋战争前（1937—1941） 日本对美宣传之初探

杨大庆

一、课题与研究方向

宣传是一种有意为之、系统化的行为（attempt），通过塑造观念、操控认知和能够直接引发回应的手段，达到强化宣传者意图的目的。在英语中，“宣传”一词主要指以欺骗的手法操纵符号和信息。而这一现象多见于二战之后。该词最初是一个宗教用语，后来逐渐被用于表示在一个不断扩展的大众社会中塑造公众舆论。一战期间，对宣传的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始构建起来。在那场大战中，主要参战国，特别是英国，运用各种媒体手段影响中立国的公众舆论。人们普遍认为，指控德国在中立小国（如比利时）实施了针对平民的暴行，是英国在美国的宣传活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并成为导致后者对德国宣战的主要因素。关于这一方面，战后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哈罗德·拉斯韦尔所写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世界走向新的冲突，对外宣传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现象更为突出。1938 年初，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发表了布鲁诺·拉斯克撰写的文章《中国和日本的宣传》（*Propaganda from China and Japan*）^{〔2〕}。在文中，他告诫美国读者，要警惕对外宣传的负面影响。不过，相对于亚洲，西方学者更关注纳粹德国的宣传手段。太平洋战争期间，情况出现了变化：美英两国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分析日本的

〔1〕 Harold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71.

〔2〕 Bruno Lasker and Agnes Roman, *Propaganda from China and Japan: A Case Study in Propaganda Analysis*; foreword by William W. Lockwood, Jr.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8.

宣传方式，并部署与日本针锋相对的宣传攻势。除了一些政府编写的文章和战后解密的文件，1944年发表的《日本的政治作战》（*Japan's Political Warfare*）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1〕}。该书内容全面详实，涵盖议题广泛，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机构和方法，包括组织、广播、报纸、通讯社、电影、审查制度、语言、科学以及艺术。第二部分研究意识形态和政策，侧重于胜利、标语和流行语、宗教。

20世纪80年代以后，松村正义（Matsumura Masayoshi）和大谷忠志（Ota-ni Tadashi）就日本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的早期案例，发表了一系列著作。^{〔2〕}近年来，许多日本和西方学者开始研究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所采取的宣传手段。无论是外务省还是战地作家，其最近发表的此类作品往往侧重于具体机构、个人或者其他一些层面。例如，热田见子探究了1931年以后日本外交部在公共外交领域所做的努力。^{〔3〕}上品和马最近则致力于公共外交个人层面的研究，他考察了有着“公共外交先行者”之称的鹤见佑辅的思想和活动。^{〔4〕}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如巴拉克·库什纳，致力于消除人们认为日本战时宣传的内容全部是关于天皇崇拜的旧印象。通过展示多种主题和形式，他构建出一个新的术语“成功的失败”（successful failure），以此表明许多非政府人员积极投身到宣传的生产和消费之中。这种战时宣传在日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后。显然，巴拉克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影响。他们在研究日本战争期间的军国主义思想时，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方法。然而，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巴拉克可能过于强调了日本战时体制下的个人“选择”。事实上，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找不到政府在试图控制信息时采用了何种方法。彼得·奥康纳在其发表于《现代东亚》（*Modern East Asia*）的那篇对英语新闻的综合研究中，探究了那些曾经在战前和战时充当日本政府喉舌的西方记者。^{〔5〕}

〔1〕 Peter De Mendelssohn, *Japan's Political Warfare*. New York: Arno Press, 1944, 1972.

〔2〕 Masayoshi Matsumura, *Baron Kaneko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05): a study in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Japan*. Translated by Ian Ruxton. Morrisville, NC: Lulu Press, 2009.

〔3〕 热田见子「日中戦争初期における对外宣伝活動」『法学政治学論究』142（Autumn 1999）；有山輝雄「満州事変期日本の对外宣伝活動」（東京経済大学大学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研究科編『日本の国際情報発信』、芙蓉書房出版、2004）；高橋勝浩「日中開戦後の日本の対米宣伝政策-「正義日本」の宣明から文化事業へ」（後藤春美・土田哲夫・服部龍二）『戦間期の東アジア国際政治』，2007。

〔4〕 上品和马「広報外交の先駆者・鶴見佑輔：1885-1973」（東京：藤原書店，2011）。

〔5〕 Peter O'Connor,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Networks of East Asia, 1918-1945*. Folkestone: Global Oriental, 2010. For a brief overview of modern Japanese propaganda in print media, see O'Connor, "Japanese propaganda pamphlets in the modern period: The struggle to influence East Asia," in Peter O'Connor ed., *Japanese Propaganda, Selected Readings, Series 2: Pamphlets 1891-1939 Vol. 1*. Folkestone: Global Oriental; 2004-2005, pp. 1-40.

日本历史学者不像西方学者在使用“宣传”这一术语时比较直白，他们会采用一系列术语来表达。正如日本学者有山辉雄所认为的：作为一个相对中立的术语，“国际信息传播（国際情報発信）”一词是内涵最为广泛的。^{〔1〕}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出版物中，用途最广的类别是情报或宣传，而舆论工作（世論工作）、启发/教育（啓発）甚至是操纵（操縦）则主要在内部文件中使用。

综上所述，本文在研究宣传时，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方法。与公共外交相比，如何运用公共信息推进具体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一个更庞杂的问题，而人们普遍认为公共外交是这一问题的一个重叠部分。公共外交涉及的首要问题是：现代官僚国家如何在战时控制和操纵信息。撇开审查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主要聚焦于日本在国际层面的宣传活动。其所讨论问题可概括为：为什么、何人、怎么办、是什么以及怎么样。“为什么”主要涉及动机；“何人”主要指参与宣传的组织和个人；“怎么办”主要包括多种技术和手段；“是什么”指的是宣传的内容和主题；最后，“怎么样”探究的是日本宣传活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二、背景：现代日本的对外宣传

明治政府面临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国家政策的关键是说服西方国家接纳日本成为“文明国家”的一员。毋庸置疑，这一工作主要包括建立现代化的体制和规则，禁止原始的和不对文明的习俗。

对外战争期间，日本急需针对国外听众协调国内各方工作，以期影响国际舆论。例如，甲午中日战争期间，西方关于日本人在中国旅顺屠杀平民的报道，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极大关注。^{〔2〕}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如今被称为公共外交的行动：通过私人层面的同心协力，影响外国精英的舆论。这一行动由日本资深政治家，曾于19世纪80年代在哈佛大学进修的金子坚太郎子爵负责在美国执行。作为哈佛期间的旧相识，金子被派往美国，旨在影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决策。日本公共外交的成果就是：纽约著名的犹太金融家们同意贷款给现金匮乏的日本，使其能够继续同俄国作战。^{〔3〕}

〔1〕 有山輝雄「満州事変期日本の対外宣伝活動」。

〔2〕 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東京：研文出版，1994）。

〔3〕 Robert Valliant, "The Selling of Japan: Japanese Manipulation of Western Opinion, 1900-1905,"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29, No. 4, Winter, 1974, pp. 415-438; Masayoshi Matsumura, *Baron Kaneko and*

一战期间，日本也没有忽视宣传的重要性。战争结束一年后，日本陆军省组建了一个新闻部门，由陆军大臣直接领导。随后，日本外务省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信息部门。1923年，日本海军也组建了类似的机构。上述每一个机构都致力于公共信息事务和宣传事务。而新媒体技术，如广播的出现，进一步突显了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利用和控制信息的重要性。

美国依旧在日本的对外信息传播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俄国战败之后，日美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两个主导性大国，从而引发了大量关于两国军事冲突迫在眉睫的猜测。虽然这一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和，但是1910—1930年，日美两国间又出现了新的摩擦。在1920—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被迫在海军军备方面做出让步；而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接纳日本移民，则进一步引发了日本的警惕。随后，一些日本人，如鹤见佑辅，开始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说。^{〔1〕}

然而，1931年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东三省，以及随后在上海发生的“八一三”事变成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经过国联实地调查后，日本的行动遭到了来自国联和美国政府的谴责。随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退出国联。此外，日本政府开始将其角色定位成“保持东亚稳定的力量”，而其军队则继续扩展在中国华北地区的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均遭到日本的反对。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日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政府能够坦然面对其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的境地，日本国内的一些机构和个人却意识到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他们试图解释这种与全世界作对的“日本案例”的合理性，并叙述日本在满洲所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

正如有山辉雄所指出的，国际新闻业在那时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新闻市场大体上被四家欧美新闻公司瓜分。大多数进出东亚的新闻，都要经过伦敦路透社的过滤。1933年，一家日本新闻机构与美国AP公司签署一项直接交换新闻消息的协议。次年，路透社与AP公司达成协议：允许对方在任何国家自由获取新闻消息。为了加强日本在国际上的新闻传播能力，日本的各新闻机构被并入同盟通信。^{〔2〕}

（接上页注）*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05): a study in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Japan*. translated by Ian Ruxton. Morrisville, NC: Lulu Press, 2009. This is the translation of his 1980 work that pioneered the studie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Japan. Matsumura has also published a study of press manipulation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日露戦争と日本在外公館の“外国新聞操縦”。

〔1〕上品和馬『広報外交の先駆者・鶴見祐輔：1885-1973』。東京：藤原書店，2011。

〔2〕有山輝雄「満州事変期日本の対外宣伝活動」，132-137。

经过多年的讨论和规划，日本的几个主要宣传机构于1936年正式成立。其中，外务省设立情报部；一个组建于1936年的、与多个政府机构联系密切的跨部门情报委员会（inter-ministerial Information Committee）则升级为内阁情报部。

三、研究方法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后，中国表示要坚决抵抗。然而，到了12月，随着日军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中国的军事抵抗开始崩溃。中国援引《九国公约》获得国际援助以及求助德国大使陶赫曼（Tauchmann）居中调停的希望也均告落空。于是，中华民国政府迁都重庆，誓言继续抵抗，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遭到了广泛谴责。日本的侵略违反了《华盛顿条约》中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条款。10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呼吁对日本实施封锁，以制裁其侵略行为。此外，关于日军大肆破坏中国和外国在华财产、杀害投降士兵和平民的报道，也频频出现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1937年8月底，一名中国婴儿在日军空袭上海南站时受伤。一幅描绘他独自哭泣的相片被各大纪录片和新闻杂志争相转载。据说在短短数月内，全世界超过100,000,000人看到了这幅相片。英美媒体也广泛报道了日军在中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袭击中国平民的情况。在发生日军飞机扫射英国驻华大使坐车，炸沉美国军舰帕奈号并致两名美国水兵死亡的事件后，此类报道达到顶峰。

日本不得不认真考虑美国公众的情绪。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日本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重要原材料，如石油、废旧钢铁和棉花。另一方面，虽然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却是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强国。因此，当帕奈号被击沉，美国提升两国间的战争预期后，日本迅速退缩，向美国道歉并提出赔偿。虽然帕奈号事件没有造成更大的冲突，但是在美国精英和民众之中，反对日本侵华的声音越来越多。一家美国报社的调查表明，当时的情况不再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那样：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站在日本一边。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媒体处理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们不仅能发行纸质媒体，如报纸、书籍和小册子，还有掌握了纪录片、摄影和无线广播的技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大体可归为三类：公共外交、文化外交以及新闻传播与操控。

（一）文化外交

由于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不了解日本及其成就，因此，他们无法理解